

评《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加拿大卷》

马 森

文化传播本是人类进化的常规，不管任何族群，都无法永远自闭而孤立地发展。在历史的进程中，通过贸易、战争、行旅等方式，或多或少地会受到其他族群的影响，或是影响了其他族群。中国也不例外，虽说在远古的时代中华民族曾经独立发展过一个时期，表现出独特的文化面貌，但是自战国以降便不断地与北方的、西方的、南方的外族交接，到了汉代以后，胡人的习俗、佛教、景教等外来文化逐渐输入中国，渐次修正着中华文明的风姿。到了元代，打通了亚欧交通的要道，甚至遥远的意大利人像马可·波罗者已经远来出仕于中国的宫廷。元清两代都是外族入驻中土，带来了北方胡人的语言、文字、习俗，然而总括而言，他们影响中华文化的程度远远不及被中华文化同化的程度，在他们逐渐汉化的过程中，中华文明的固有面貌并未大幅度地改变。但是到了19世纪中期，西方列强东进，经过鸦片战争及连续不断的军事强权的侵蚀，中国的固有文明竟被东来的西潮冲击得零落破碎，面目全非，不得不改弦易辙，舍己以从人地扭曲了原来的发展方向。

19世纪以降的西潮东渐大幅度地改变了中国固有的轨辙，迫使中国走上了现代化（也可说是西化）的道路。这种剧烈的变革，对中国人民而言，既是巨大的灾祸与苦难，也是使中华文明在追求生存中重新自我塑造的契机。在中国历史上这是一次空前的大转折，不论上层的意识形态还是下层的社会经济建构，都不能不向西方倾斜，作为精神文明的文学自然也不例外。鸦片战争以来的第一度西潮东渐，到中国的知识分子高声向西方呼唤德先生和赛先生的“五四”运动达到一

次空前的高潮，为中国文学带来了西方的写实主义；1949年后发生在台湾地区的第二度西潮（将近三十年后也轮到大陆）又为中国文学带来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因而完全改变了中国文学的传统面貌，而不得不称之为“新文学”了。在这种巨大的变革后，近代和现代的中外文学交流便成为学术上不能不令人特别加以关注的焦点课题，于是有钱林森、周宁主编的十七卷皇皇巨著《中外文学交流史》在国家出版基金的资助下问世。

笔者身居加拿大，近水楼台首先接触到的就是《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加拿大卷》。此卷由梁丽芳教授和马佳博士主编，参与撰述的尚有张裕禾、蒲雅竹等学者。加拿大在近代中西交流史中本处于边缘地位，不能与英、美、法、德、俄等所谓的世界列强并肩，但是由于加国的国土广袤，自然环境优美，物产丰富，政治民主，生活自由，社会治安良好等条件，越来越成为外来移民向往的“世内桃源”，中国的移民也越来越受到加国的吸引，以致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从大陆及港台地区来此就学及移民者有逐年增加的趋势。根据2011年加国的人口普查，中国移民的数量已达一百五十多万人，大多集中在温哥华和多伦多两地，约占加拿大总人口的4.5%，仅次于英、法、苏格兰、爱尔兰、德国的移民，与意大利的移民数量等同，超过了加拿大原住民的人口，因此在公用英法两语外，华语也成为加国常用的重要语言之一。在这种情形之下，加拿大华文文学也足以成为整体华文文学的一个旁支，使华文文学像英、法、西语文学一样，呈现出在世界各地遍地开花的形势。

《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加拿大卷》的出版可说恰逢其时矣。此书包括三大板块：加国的华裔华文文学、加国的华裔英法两语文学、加国英法两语文学与中国国内的华语文学间的交流，其中也包括了两国的作家与学者之间的交流。正如本书总序所言：“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就学科本质属性而言，属实证范畴，从比较文学研究传统内部分类和研究范式来看，归于影响研究。……因此它要求拥有可信的第一

手思想素材，要求资料的整一性和真实性。”（第4页）因而在第一板块中，撰述者花了很多精力在查勘、梳理第一手数据，也就是自早期中国移民开始在加国发行的报章刊物以及私人的文件、书信上。这是件非常吃力的工作，为后来研究者铺垫了坚实的基础，功不可没。其中对加拿大汉学家与中国文学的关系一章叙述得尤其详尽周到。对从20世纪中期以来越来越多的加国华裔的华文作品也广为搜罗，加以评鉴，足以看出撰述者的耐心与功力。在第二板块中，撰述者同样广为搜罗了加国华裔作家的英法两语作品，在华裔英语文学中特别凸现出短篇小说的成绩，认为“主题和意象却是多元纷呈，从离散-聚合到身份认同，从女性主义到同性恋权益，从鬼魂的意象到唐人街元素，不一而足。……就艺术手法而言，传统的写实主义占据主导，但精神分析、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批判等散见其间”（第252页）。华裔作家的英语长篇小说成绩也很突出，例如李群英的《残月楼》（1990）、刘绮芬的《第三者》（1995）、黎喜年的《千年狐》（1995）和《咸鱼女孩》（2002）、崔维新的《玉牡丹》（1995）、李彦的《红浮萍》（1995）、余照昌的《鬼魂火车》（1996）和《玉镯》（2002）、翁云芳的《被拒的妻子》（1999）、陈泽桓的《禁山之风》（2003）、胡功勤的《香蕉仔》（2004）、柯温爱的《行者童僧》（2005）、林浩聪的《放血和奇疗》（2006）等，还有华裔法语作家应晨其间也出版了六本法文小说：《盘石一般》（1998）、《悬崖之间》（2002）、《骨瘦如柴的妇人跟她影子的争吵》（2003）、《家门口捡到的孩子》（2004）、《食人者》（2006）和《妻子变猫记》（2010）。在短短的十年间华裔作家出版了如此众多的英法两语的说部，而且累累获奖，形成了本书作者所谓的“井喷现象”（第301页）。作者针对每一作家、每一作品都作了细致而深入的评析，彰显出各作家所具有的独特风格，为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第三板块中，主要是记述中加两国间的文学交流，可以看出来两国间的文学交流起步未久，仍然处于双方相对都认识不深的阶段。谈到交流，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都处

于入超的状态，也就是无论物质或精神产品，多的是进口，出口的微不足道。特别是文学、艺术、音乐等，多半是向西方取经，而能给予他人学习的项目至为微薄。到了今日，中国的经济状况与国势都大为改观，也许物质产品反转呈现出出超的状态，但精神产品却仍未能反转长久以来的劣势。加拿大在文学上相对于欧美诸国虽然也是入超的国家，唯对中国而言又似乎占据着西方文明的优势，因此加国的文学在中国的传播虽然说不上广博，相对地中国的文学在加国的传播可就更加稀微，从本书罗列的中加两国文学作品的互译上明显地看出这种情势。例如，1995年中国出版了《加拿大文学辞典》（王彤福、曹德明主编），但在加拿大研究中国文学还得靠美国提供的资料。北大教授龚鹏程在去年11月末台北举行的“全球华文作家论坛”上尝言：“中国现代文学不过是西方文学的山寨版。”（见2015年12月号《印刻文学生活志》，第46页）虽然这句话并不正确，当场就受到了驳斥，因为任何国家的文学作品，都难以摆脱前人及外来的影响，与仿冒的物质产品不能同日而语，但是却也透露出中国现代文学追踪西方文学足迹的讯息。从鲁迅的《狂人日记》到莫言的《丰乳肥臀》，无不烙印着西方文学的印记，更不要说“横的移植”而来的现代诗了，这都是长久以来精神产品入超的结果。

这部大作确是研究中加文学交流史的开山之作，不但提供给我们扎实的资料，而且也可以引起我们反思的兴味，同时其中所涉及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和离散（diaspora）主题，又可作为比较文学的珍贵参考。

不过，任何精心的作品都难免有值得修正或补充的余地，下面我就提出一些这方面的意见，以供主编者和撰述者的参考。（一）第三章第五节之二白话剧：早期华人的现代舞台中言：“1907年，欧阳予倩（1889—1962）在东京成立春柳社。”（第137页）按：春柳社是李息霜（又名李叔同，出家后人称弘一大师，1880—1942）发起成立的，欧阳予倩于一年后才加入为社员。（二）第四章引言：“因歧视

政策而中断的文学人士的来往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得以复苏，著名学者叶嘉莹、梁锡华，诗人洛夫、痖弦，文化名人胡菊人等均移居加拿大。”（第150页）其实正文部分也谈论在叶嘉莹前后于六七十年代移民加国的冯冯、东方白、朱小燕、梁锡华、马森等一大批作家，此处开宗明义，最好先点明。（三）第四章第八节谈到粤剧与话剧的演出，反倒忽略了加国华裔剧作家的华文剧作，因为在以后的章节中对华裔剧作家的英、法两语剧作均有详尽的介绍。（四）第五章第一节，关于诗人弗雷德·华（Frederick James Wah/Fred. Wah）（第215页），他的中文姓氏应该姓华，但是文中说他的祖父名关存礼，祖孙不同姓，不知是否与同页另一诗人关山混淆了？如否，应加以说明祖孙不同姓的原因，以免使读者困惑。（五）第七章第四节中国学者对加拿大文学的研究，独缺台港两地的资料，应该补入这两地的数据。（六）第九章第一节在讲述魁北克华裔作家中独独遗漏了多年前移民到蒙特利尔的薛忆沅，他的长篇小说《白求恩的孩子们》（2012）是一部杰出的作品，曾令文学评论家刘再复读后狂喜不已。他另有长篇小说《遗弃》（1989）和短篇集《流动的房间》（2006）、《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2006）等，其中多篇都与白求恩有关。（七）在编排上，将注释及参考数据均以极小的字体置入正文行间，非常难读，必须用放大镜才看得清楚，反不如传统上以脚注的方式置于每页下方。（八）此著书末有附录，但缺少索引，作为一部学术参考著作，如果加上关键词与人名索引（如今用计算机程序制作是很容易的），则会更加完善。